

论抗美援朝运动中民众的爱国情感教育

——以河南省抗美援朝运动为考察对象

王献玲

(郑州大学教育系,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民众爱国情感教育,以近代美帝侵华史和朝鲜战争时事为素材,以发动民众控诉美、日、蒋罪恶为形式,以回忆、对比新旧社会为方法,极大地激励和调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的高度认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抗美援朝;民众教育;爱国情感教育

中图分类号: J7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3)04-0152-04

情感教育是特殊的思想动员方式,旨在通过激发个体情绪、调适其心理沿着设定的目标转化并形成坚定的意志。在教育学上,处身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用真情实意去触发、感化教育对象,从而获得感情上的呼应与共鸣,这种情感教育方法较之空洞的说教要更有实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运用情感教育方式,调整民众的社会心态,使之与党的政治目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一、民众爱国情感教育的提出

对抗美援朝,起初不少人心存疑虑,表现为畏战、崇美、恐美。比如,在河南省某些地区,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开始前,“干部群众思想是异常混乱的。老干部在朝鲜战争第一阶段是思想麻痹,满不在乎。新干部在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盲目恐美,因而不敢宣传形势,怕群众思想波动……知识分子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教育较深,盲目的崇美并变成了严重的恐美病,朝鲜战争进入新阶段后,他们表现保持中立观望,不敢进步。农民是恐慌害怕,情绪不安”[1](P20-21)。显然,民众中存在的这些疑虑心态如果不及时调整,会对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策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抗美援朝,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认识问题,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时事的宣传运动。”该指示强调,要统一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

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2](P211)。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对民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注重在于心态调整。实际上,以当时的国情和民众的觉悟程度来看,由情感教育为突破口实现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较之其它途径要更为适宜。

首先,在解放初期,普通群众的政治觉悟与党的政策水准是不平衡的。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群众当时“仅仅关心的是与自己利益有直接密切联系的土地改革,以及农产品增收。认为抗美援朝是国家的事情,与他们何干?”上级派检查组到农村宣讲抗美援朝时,“发现群众的思想都集中在缴公粮上,你讲时事,他就随便应付你几句‘就是,就是’。你提出问题,他就说:‘乡下人那里知道这些事!’有的农民问‘朝鲜离咱这里有多远?’你讲清了距离,他就说‘那还远哩!’”[3]可见抗美援朝运动初期民众觉悟与党的政策是有差距的,这时如果对民众一味地讲抗美援朝的大道理未必能使其信服。

但要看到,也正是因为全国刚刚解放,人民群众对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惨状深怀忌憚,对新中国政通人和的盛况欢欣鼓舞,这种情感上的反差在当时十分鲜明。如果把握好民众的这种情感反差,将抗美援朝和捍卫新中国联系在一起,让群众明白抗美援朝就是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美好家园,那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诚如当时的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吴玉章所指出的:在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与步骤上,“着重控诉美、日、蒋的罪行,回忆过去,比较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王献玲(1963-),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教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理论研究。

现在,藉以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引导群众由反日、反蒋走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4](P739)。

其次,抗美援朝是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打赢这场战争需要全民族同仇敌忾,鼓足士气,以弥补我们物质力量上的弱势。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具有明显的动力功能,当个体受强烈的情感震撼和驱使时,往往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这就告诉我们,发动民众支持抗美援朝需要我们充分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如当时的报纸所言“普遍开展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运动,以提高警惕,加强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的精神,巩固我们的国家建设和心理建设,实为我们战胜美帝的两把犀利武器。”[5](P33)

二、以历史和时事为素材,激发民众仇美义愤,增强抗美援朝决心

抗美援朝爱国情感教育把大量美帝侵华的历史资料和正在武力威胁、挑衅新中国的时事告知世人,激发了民众的仇美义愤,增强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一) 依据历史,揭破美国侵华的真实面目

在近代史上,美国对华关系曾有过貌似“友善”的举动,比如在清末民初美国对中国实施“庚款兴学”,曾赚得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二战期间,美国在作壁上观四年之后因珍珠港之耻而加入对日作战,靠着原子弹轰炸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这更使一些中国人对美敬畏有加。受这种认识影响,当听说抗美援朝要和美国人打仗时,一些人是转不过来弯的。这就有必要把近代以来中美关系历史全面展示于世,让国人认清侵略者的真实面目。195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时事宣传提纲——《怎样认识美国》,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也是一贯侵略我国的”,从184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开“治外法权”和“利益均沾”的侵略先例以来,直到解放战争期间援助蒋介石政府,一百多年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文中列举了一系列的美国侵华事件,比如:1857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帮凶英法联军进攻我国天津和北京,1873年伙同日本进攻我国台湾,1900年入伙八国联军进攻中国,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利,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军事物资,日本投降后极力扶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等[4](P676-677)。这些历史事实使民众了解了美国的侵华罪行,认清了美国侵略者的真实面目。

在进行历史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党还注意把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百年中国近代历史其实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血泪史,其中日本的侵略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伤痕。如果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美国的侵略行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过的侵略政策的再版时,就会对民众的民族心理产生强烈震荡,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转向对美国的仇恨。当时我们党及时

地抓着了民众的这一情感特征进行宣传。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讲到“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6](P52-53)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4](P36-37)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指出“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它的衣钵却被美国侵略者继承下来了。”[4](P686)

(二) 立足事实,感受美国正在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威胁和挑衅

历史教育,通常发挥的是长效性功能,但面对抗美援朝的急迫形势,对民众的教育更需要时效性。所以,除了进行历史教育之外,还要有现实教育,要让民众意识到美国正在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威胁和挑衅,祖国正处于危急中,人民群众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园正面临着得而复失的危险。

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通民众“家”的观念十分强烈,当时美国的武装侵略和挑衅已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危,覆巢之下无完卵,在这种情势下,结合民众的“家”利益观开展宣传教育,让大家感受“要保家就得卫国”“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可有效促发民众抗美援朝的决心。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讲道“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在南面早已延伸到我国的台湾,在北面现在竟扩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了。美国的空军,愈来愈频繁地向我国边境袭击。现在一切事实,都彻底地打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外国助理人的花言巧语,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将侵略战争引向中国的罪恶阴谋。”“种种现实说明,美国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门前了’。”[7]

通过上述历史教育和时事宣传,使民众认识到了美国侵略者的真实面目以及对新中国的现实威胁,增强了民众对党中央抗美援朝决策的认同感。在河南省,全省各地“形成了群众性的伟大思想革命,燃起了反美爱国的怒火。工人说:日本孬,美帝国主义坏,咱们刚站起,不能再躺下。农民说:美帝国主义孬孙来,蒋贼要回来,地主再起来,咱们吃不开,说啥也不能不爱国,要爱国就捐献,要捐献就增产!工商界说:抗美帝,挡日本,保和平,安生产,捐两个钱并不亏!”[4](P1238)这段文字表明民众在心理上普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抗美援朝,

保卫好家园,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正是这种民族义愤和现实利益观的驱动,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中民众社会心理的迅速调适。

三、以控诉和回忆为形式,强化民众爱国热情,坚定抗美援朝信念

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动员的特点是“情感高于理性,形式重于内容”[8](P188)。在抗美援朝爱国情感教育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形式效果,比较多地采取了控诉、回忆等方法,对比今昔,诉美日蒋的苦,强化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坚定了抗美援朝的信念。

(一) 控诉活动的开展

在情感教育的活动中,控诉综合了语言劝导、形象感染和行为影响的多重功能,是促进情感认同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时爱国主义教育中很受重视。1951年3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提出“在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根据已有的经验,最好是采取控诉或回忆的形式。每个工人职员都可用自己遭受的痛苦来控诉日本及蒋介石匪帮过去对于中国人民的各种暴行,一直引到美帝国主义援助蒋匪和武装日本的罪恶,以激发工人阶级对于敌人的深刻仇恨”。“这种控诉与回忆的方法是最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4](P726)《人民教育》亦载文指出“采用控诉会、回忆会等一类的方式,以群众亲身痛苦的经历,控诉美帝的罪行,启发其仇恨心理和斗争意志。”[9](P59)

控诉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比如,河南省许昌地区系统地进行了“三查一比”(查翻身、查当家、查敌人、以甜比苦),工商界控诉美帝国主义“摧残许昌烟草血泪史”。临汝知识分子控诉“美蒋特务合作训练班”等罪行,划清敌我界限[4](P1237)。郑州市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的四个月中即组织工人阶级控诉三十七次,参加者约三四千人。妇联在“三八”节前组织控诉二十几次,参加者近二千人,青委也组织控诉三次,参加者一千五百余人[1](P52-53)。

(二) 控诉活动的有效组织

为使控诉活动充分发挥感染力,当时采取比较多的形式是诉苦和回忆,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组织民众控诉时,常常要启发民众通过回忆意识到“苦”的存在,激发控诉的积极性,同时领导干部还要带头诉苦。比如,河南省公路局汽车修配厂开展控诉时,“首先是启发动员,结合报刊载的日本鬼子的暴行,结合本人遭遇和听到见到的事实,展开酝酿漫谈讨论,引向带诉苦性的回忆……领导诉苦的干部,要站在这一运动之中,切忌以干部或领导运动的身份出现在诉苦场合,自己有苦时,要带领先诉”[1](P62)。在河南省临汝县,“在县政府做了八年工作的工商科长,有十二年工作历史的宣传干事,也诉苦诉得抱头大哭,以此激发了干部、

群众的仇美思想”[1](P21)。

诉苦还要注意引导民众“诉什么”和“怎么诉”。在诉苦运动刚开始时,民众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匪帮的多,诉美国强盗的少,这样就脱离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实际。为此,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引导民众由诉旧中国蒋匪帮的苦联系到诉当前美帝国主义的苦。“各地群众普遍地经过控诉、追根、回忆、对比座谈讨论等方式,首先进行了‘打倒地主挖蒋根、打到蒋匪挖美根、打到美帝国主义挖祸根’的三根教育。继而进行‘战争比和平、流血比流汗、新中国比旧社会’的三比教育,由地主联系到美帝国主义,由翻身联系到共产党,划清了敌我界限,形成了群众性的伟大思想革命,燃起了反美爱国的怒火。”[4](P1238)临汝县的农民们经过诉苦运动后愤怒道“过去只知道穷根在蒋介石身上,谁知道总根还在美国身上。”“光打倒土恶霸不中,非打倒洋恶霸不行。”[1](P23)

在当时,诉苦是广大民众国家观念形成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大民众在诉苦和回忆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土地、财产是新中国给的,从而产生了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固化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的认同。在河南省临汝县,“群众诉苦后喊出‘再不当亡国奴’、‘再不当孬种’的呼声。纷纷要求参军复仇,妇女经过了诉苦后,提出了报名送子送夫参军及踊跃捐款慰劳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县妇女共捐款7473100元(旧币,下同)物资53360件,慰问信1473封。通过诉苦,树立了干部群众仇美思想”[1](P22)。

四、民众爱国情感教育的巨大成功

情感教育以其能够打动人心、调适心理的显著效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热情,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伟大运动。

(一) 进行爱国生产劳动竞赛

抗美援朝运动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在物质上的支持,但当时人民刚刚解放,生活还十分困苦,要想捐献物资支援前线,就必须增产节约。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普遍开展起来。河南潢川农民提出“捐献不卖粮”、许昌群众提出“捐献不掏老本”的增产口号。郑州等市的工人把工厂比战场,废品比美帝国主义,说“多纺一根线,等于抽美帝国主义一条筋,多织一尺布,等于剥美帝国主义一张皮。”[4](P1238)许昌地委提出,把爱国主义教育同当前工作、生产结合起来,把各项工作化为抗美援朝的具体内容,广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实现“抗美援朝,增产一成”的目标。对此,195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一文,对许昌各级党组织运用党的宣传工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抗美援朝运动做了专门介绍。在开展爱国生产劳动竞赛中,涌现了众多的劳动模范,比如黄河

护堤锥探工人陈兴中说“护堤锥探是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我来参加锥探消灭隐患,就等于打美国鬼子。”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热爱钻研,从一开始每天锥十几个眼很快提高到二三十个眼,一个月后达到每天能锥三百多个眼[10]。

(二) 踊跃参军参干

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推动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空前踊跃地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新的战斗力量不断地参加到志愿军的队伍中来”[4](P397)。在河南省,“涌现出万余起轰轰烈烈送亲人上前线的模范事例,在广大知识青年和工人参干运动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争先报名,联名参干等动人事例。这种‘爱国第一’的无上热情,感动了许多人民,广泛形成爱国光荣的政治空气”[4](P1237)。

(三)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武器、优抚烈属军属

为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全国各地迅速行动,使抗美援朝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在河南省,“全省在城市约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家,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在订立爱国公约时,人们自动提出‘说到办到,不放空炮’的口号来互相鼓舞,互相勉励,因之爱国公约就成为广大群众的爱国行动纲领,成为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通过爱国公约的形式,把自己的爱国思想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将爱国热情变为雄伟的力量”[4](P1238)。在捐献方面,“全省顺利地完成了捐献缴款2675.88015427亿元,折合战斗机178多架,超过原定计划,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4](P1238-1239)。在优待烈属、军属方面,全省各地以实际行动表现对革命烈属、军属的热爱和敬重,比如,开封市开办了鞋厂、麻袋厂,保证了他们的就业。农村普遍提出“三保证”(深耕细作、多打粮食、不荒寸土)和“六优先”(先犁、先锄、

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对烈军属进行了周密的照顾[4](P1239)。

(四)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1月,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能力。2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侵朝美军撒布细菌的罪行。为了积极有效地支援中朝军队,彻底粉碎美帝细菌战计划,全国人民迅速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一年内,河南省清除垃圾9620余万公斤,疏通阴沟88200余万公尺,捕蝇约364亿个,捕鼠258万只。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进了河南人民的卫生状况[4](P1239)。

除上述爱国活动外,全国人民在慰问志愿军、捐献慰劳品、参加志愿医疗队等方面都很积极踊跃,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比如,1951年4月20日河南省医务工作者组织的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出发赴朝。“该队出发前,河南省及开封市的医务工作者与各界代表四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开封市医药界及工商界并捐献药品与医疗器材等一百余种,并有购买药品的现款480余万元。该项捐献物品已由队带往前方。”[11](P629)

抗美援朝爱国情感教育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切入点,有效地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的社会心态的整合,彻底清除了近代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造成的心理痼疾,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场伟大的民众爱国情感教育活动,不只是为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且也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升华,进而展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图存而同仇敌忾的决心、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进的毅力、为世界正义而抗暴救难的浩气。

参 考 文 献

- [1]中南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M].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
- [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 [3]王昌隆.农村宣传的几点体会[N].人民日报,1951-01-14.
- [4]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5]《文汇报》社会大学编辑室.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M].上海:上海文汇报社,1950.
- [6]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N].人民日报,1950-11-06.
- [8]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9]皇甫瑾.对工农群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几点经验[J].人民教育,1951(2).
- [10]国维.大锥能手陈兴中[J].新黄河,1952(8).
- [11]新华社.河南医务工作者志愿手术队赴朝工作[J].科技通报,1951(6).

(责任编辑 郑良勤)